

文史哲博士文丛

WENSHI ZHEHOSHUIWEN CONG

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 中的梁实秋

◎ 刘聪 著

齊魯書社



文史哲博士文丛

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 中的梁实秋

◎ 刘聪 著

齐鲁书社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重点项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的梁实秋/刘聪著. —济南:
齐鲁书社, 2010.5

ISBN 978 - 7 - 5333 - 2399 - 8

I. ①现… II. ①刘… III. ①梁实秋(1903~1987)
—人物研究②梁实秋(1903~1987)—文学研究 IV.
①K825.6②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7193 号

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的梁实秋

刘聪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 32

印 张 11.5

插 页 2

字 数 279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33 - 2399 - 8

定 价 29.00 元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编委会

主任委员 李 群

副主任委员 张全新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兆成 尹慧敏 齐 涛 刘德龙
安世银 张 华 蒿 峰 颜世元

序

朱德发

记得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写过这样一句：“能凿壁，会悬梁，偷天妙手绣文章。”我曾将它作为激励自己的箴言印在脑际，然而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磨炼我并没有获得这样神奇的创作本领，长篇短篇文章写得不算少，能称得上“偷天妙手绣文章”的却几乎没有，这并非谦虚而确是实情。我常说，我们这一代正赶上穷折腾的灾难岁月，“读书无用”论、“写文章有罪”论消解了我们的青春活力，熄灭了我们胸中奋发向上的心火，导致我们这一代在学养和知识上的“先天不足”；尽管到了新时期千方百计地努力“补课”，但是岁月催人老、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总是在文学研究中获取不了“偷天妙手绣文章”的硕果。值得我庆幸欣慰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和思想解放的阳光成长起来的青年学子，尤其那些有理想、肯吃苦、有抱负、肯磨炼的博士们，他（她）们经过精心深思撰写出的学位论文，其中不少称得上“偷天妙手绣文章”的成果。也许对“偷天妙手”的高超才能及“绣文章”的衡估标准见仁见智，不过在我的眼中那种获取省级以上优秀博士论文奖的应算是“偷天妙手绣文章”的硕果。固然汤显祖所指“绣文章”的神奇本领应似文艺家创造的审美文本，若是广而用之那也该包括

治学所写成的学术论著。摆在我面前的专著《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的梁实秋》就是曾获得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奖的同题经过著者刘聪博士细心打磨而成的，与同代的女学者的博士论文相比，它应列入“偷天妙手绣文章”的荣誉榜。诚然，任何论著或文章都不是至善至美的，不过即使挑剔出一些瑕疵也不会影响本著作的开拓性与创新性的优秀品格。

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像梁实秋这样性格内涵复杂而又特立独行的文人，因置于政治意识形态框架给以上纲上线的任意定性定位，难免被妖魔化的厄运，其人其文的本真历史面目长期被扭曲被遮蔽；新时期以来对梁氏的研究虽然纳入拨乱反正的学术轨道，但由于选择的考察视野、探讨思路和评价尺度与研究对象本身的错综性深邃性并不完全吻合，甚至有较大的差异和隔膜，故而尚未达到正本清源的学术要求。本论著选取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来探究梁实秋，既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顽固纠缠又突破了现有的不太适宜的研究路径，而纳入了一个与梁氏其人其文的杂多内涵相契合的具有创新色彩的理论范式。这样的理论范式构成，既借鉴了融文学、史学、哲学为一体的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又来源于著者通过对梁实秋其人其文的重新解读重新发掘所获得的深刻体验和总体把握。即不只是从白璧德新人文主义进入中国特殊文化场域中，发现了梁实秋的人格和文格正是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五四启蒙文化思潮相激相荡所型塑而成的，而且发现了白璧德人文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结缘和对话中起决定作用或桥梁作用的不是学衡派而是梁实秋。这种新发现与现代新儒学相融合所形成的学术视野与理论框架，对于梁氏本体既能洞察其文艺理论文本与文学创作文本之奥秘与深微，又能梳理其文化活动及文学行为的是非曲

直，从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上对梁氏的复杂性给出切合历史真实和逻辑真实的阐释。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来研究梁实秋，它的意义不限于将梁氏的个案研究提升到新的学术层次，它更具有深化 20 世纪中国文化文学与域外文化和传统文化关系研究的普适价值：一是提供了新视阈、新思路和新方法；二是打通了古今中外文化的互通关系；三是确立了现代新儒学文化在 20 世纪总文化系统中的合法合理地位；四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型文学与文化提供了有益的美学资源和思想资源；五是发掘出了赓续儒家血脉的诗学文论和文化文论，以救治 20 世纪中国“文论失语症”。特别是现代新儒学作为肯定性的价值评估标准的出色运用，不仅为研究现代中国文化文学增添了新的价值坐标，也为现代中国学术宝库充实丰富了新的价值内涵。选取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研究梁实秋其人其文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本专著的价值，也折射出研究主体敏锐的学术智慧。

梁实秋作为一个复杂且有争议的研究客体，进入研究主体的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对其所进行的勘探、剖析、概括和判断而生发出的新见解新结论，令人感受到创新的力度。著者认为在五四新文化场，梁实秋与白璧德人文主义并非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而是前者对后者的必然选择，这是因为“梁实秋发现白璧德的话语与儒家思想暗合，于是在现代性→白璧德人文主义→孔子（或儒教）这样一种思维链条上，以儒家伦理学说为体，以白璧德人文主义的文论——古典主义文论为用，开始建构中体西用的中国特色的文学话语”。这种概括颇有新意，揭示了传统儒学通过梁实秋巧妙地与白璧德人文主义嫁接而发生了现代性转换，为中国多元的新文化文学系统增进了新的一

元，这就使梁实秋所持的文化立场与学衡派有所区别，即“他承认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基本价值，即质疑传统、学习西方以及提倡白话文”，显示出梁氏在现代与传统、激进与保守相互对峙制衡的文化格局中的独特地位。由于梁实秋对白璧德的选择基于现代化立场，故而他从白璧德人文主义中寻找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家学说的解码，而这个解码就是白璧德所称道的现代性核心理念“人的法则”，它与儒家所提倡的“仁者，爱人”、“泛爱众”的人文主义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人的发现”的命题有意脉相通之点；梁氏选择了白璧德的“现代性”人文主义实质上也就贯通了儒家人文主义，对儒家学说进行了创造性的现代性阐释，早在五四时期郭沫若站在新文化立场上也发现了孔子思想中可以与现代意识对接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这种新的阐释不仅洗去了梁实秋身上被贴的“古典主义”、“保守主义”、“白璧德教授的门徒”等暗含着落后与守旧的标签，也还他一个“真正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风貌。文学批评是梁实秋致力于新文学活动的强项，也是争议最大的焦点，将其纳入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予以考察与评述，给出了一种新的理性概括：梁实秋的文学批评话语是一种典型的义理式的文学批评，而这种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是人性论，主要强调人性的善恶二元论，强调以理制情的道德意义，强调人性的普遍性和永久性，强调人生三境界说，这些都是中国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题中之意。对梁氏文学批评话语所作出的阐释，既破除了机械阶级论的误读又抹去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痕迹，完全立足于超越阶级、超越党派的跨文化立场对二、三十年代梁实秋参与的文学论争及其理论主张进行学理性的探究，彻底摘掉了梁氏头上多个沉重的带有辱骂性的政治帽子，不论对梁氏其人其文

或参与论争的评判都是以学术文化话语取代了政治霸权话语。例如 30 年代人性论与阶级论的争论，著者一反资产阶级人性论与无产阶级阶级论不可调和斗争的论断，而是作了这样的论述：“以人本主义的人性论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在抽象与一般、本质与现象的范畴内与左翼论战，表现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对峙，以及文学贵族（高雅）性和大众化的对立。”也就是说，梁实秋所信奉的不是资产阶级人性论而是现代新儒学文化体系中的以人为本的人性论，它既源于传统的儒家学说又联通了白璧德人文主义人性论，因此它与左翼文学的论战是不同层次的现代文学理论内部的论战，都是为了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建设，实践证明以人本主义的人性论来规范中国新文学也许更合乎现代文学发展规律。关于“抗战无关论”的重新认识也涉及对梁实秋的总体评价，尽管近几十年对此次论争有了很多新说法，然而把它置于现代新儒学视野来考析却是罕见的。抗战时期发生的“抗战无关论”之争，之所以不能作为一个纯粹学理性的学案来对待，其深层的政治背景少有人揭破，却原来因为梁实秋参加的国家社会党是个具有浓厚新儒家文化色彩的党派，他与张君勱代表该党出席国民参政会曾与共产党参议员发生激烈冲突，在共产党眼里他被误认是“拥汪主和”派，故而论战中对手对梁氏的批判根本就不是站在学理的立场上，实际上成了政治上的抗战派与主和派的大是大非之争；处于这种四面楚歌的境遇，梁实秋选择了沉默中坚守的方式，放弃了文学批评开始了雅舍系列的散文创作。这种解释既切合历史真实又符合其在“兴无灭资”框架中长期被误解的政治命运。从 20 世纪 30 年代至 70 年代，梁实秋其人其文进入左翼阶级论视界始终被误认为“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的符码，如果说

以前的身份确认把梁氏同胡适绑在一起视其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核心成员是一种误解，那么本著作能够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潮涌现出的“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派”和“马克思主义派”的三大派别的比较中将梁实秋的准确身份定性为“现代新儒学文化派”，这是学术研究的新发现，也是对梁实秋其人其文的正本清源。不过，对梁实秋的整体研究无论采取何种框架与思路都难以绕过他与鲁迅之间冲突所形成的典型学案，虽然对此案的研究始终是学术界的热点，也涌现出不少有见地的看法，但是能作出这样的思索与概述：“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中国取代儒家人性论思想的中国，是20世纪文化观念中触及世人灵魂的最深最广的革命，鲁迅和梁实秋的论争是在文化体认差异中开始的”（以上所有引文，皆出自本书），却是极为可取的，这无疑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就是说，梁实秋与鲁迅的论争本来源于对两种思想文化体系的选择、坚守和体认的差异，应该属于文化认识范畴或学术研究范畴的问题，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而其意识形态则获得了绝对话语权，鲁迅作为其文化文学界的典型代表的地位越来越高，直到被推上“神坛”；而作为现代儒家文化在文学上的核心人物梁实秋随着马克思主义阶级论被泛化和乱用则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文人”或资产阶级的“鬼魅”。尽管这两种文化思想的文学界典型代表一个被捧上天一个被踏在地，然而其命运却都是过度膨胀的政治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悲剧；只有从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来重新辨认，才能从诸多政治谬论中显现梁实秋真实的文化面目以及与鲁迅论争的错位和实质。

总之，这是一部有开拓性、有理论深度、有创新意识的学术专著，破解了梁实秋研究上不少的老、大、难问题，作出一

些令人诚服促人深思的理论解释，凝成了不少的学术创新点和增殖点，以一种有力度的学术话语取代了意识形态的套话空论，将梁实秋其人其文的研究向文化纵深推进一步。著者之所以能取得“绣文章”的硕果，也许经验体会很多，但是在我看来主要有这样两点值得提及：其一，敢于向“权威”话语和习惯势力挑战，这是对研究主体理论勇气和学术胆识的严峻考验。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激荡下，学术研究的外在环境越来越自由宽松，但是人文科学的禁忌还有不少，尤其梁实秋的研究触及一些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势和习惯势力。如对梁实秋人性论的论断早有政治权威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定性，而且这种阶级定性不只是写进了经典著作、各种文学史和文艺理论文本，也深深地烙进了众多知识分子和政治官员的脑际，因此要冲破这种思维定见所形成的社会习惯势力是需要很大理论勇气和学术魄力的；也只有冲决了这重重的思想网络和思维习惯的禁锢，研究主体才有可能进行大胆的探索，从各种人性论的相互比较中认定梁实秋所秉持的不是“资产阶级人性论”而是现代新儒学的人性论。这一新发现和新判断，既否定了政治权威的论断又匡正了习惯势力的成见，这是一种可贵的学术探险精神。可能有的人不同意把梁氏的人性论说成是儒家人性论，但是它作为一种新见却是言之成理、论之有据的。人文科学领域的理论创新太重要了，如果总是维护坚守那些已被实践证明失去了“真理”威力或者根本就是谬论的僵硬教条和理论思维，不敢挑战它们，惧怕冲破它们，那我们中国在全球人文理论的发展与创建工程中仍然是无所作为的，“文论失语症”何时能根治？其二，拓展学术视阈，强化理论思维，广泛搜求资料，充实知识结构，本书的著

者在这方面所下的工夫是值得尊重的。尽管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梁氏在台湾的资料不易搜全，然而大陆图书馆的所藏却尽力索取占有，不仅获得了大量原始资料也广泛地查阅了对梁氏研究的资料，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现代新儒学文化的原典文本和研究论著进行了较系统的阅览，对新儒家的钻研既深，汲取又多。要是著者只满足于资料的搜集和阅读，那只能说为本书的撰写作了较扎实的先导工作；而更为可贵的是著者非常重视对各种资料的消化吸收和分析整合：一是通过对有关梁氏本身的史实和文本的解读体验，发现并通晓了梁实秋与白璧德人文主义和传统儒家文化的深层关联，仿佛他们的灵魂与文心是与其息息相通的，即白氏与儒家文化的碰撞对接所形成的另类“现代性”人文主义既塑造梁氏的人格又铸成了他的文格。而这种新认识和新感知却是以充盈的实证的史料作为支撑的，它既内化为主体的知识结构又形成主体的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尤其有选择地汲取的新儒学研究成果不仅强化了此种文化学术视野也深化了主体的理论思维范式。二是占有的资料再丰富若不进行深入分析、梳理辨识和归纳整合，那是绝对不能建构一部逻辑严密自成系统的学术专著。虽然我不敢说本著作的结构框架是无懈可击的，但它的篇章布局却显示出论者的匠心独运。不管对白璧德与梁实秋关系、人性论与唯物论冲突、“与抗战无关”之争的论述，或者鲁梁学案、雅舍小品、贵族诗学的剖解，都不是以资料的堆砌取胜，而是有清醒的辨识和深度的分析，然后把它们归纳整合到以“现代新儒学”为中心贯穿线索的既严密又有弹性的逻辑架构里，使全书的所有章节都环绕于“现代新儒学”这个逻辑主轴，可见分析整合能力是学术研究主体所必须具备的。

刘聪博士出色地运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研究梁实秋其人其文所取得的趋优成就是值得祝贺的，然而这仅仅是漫长的学术征程上所跨出的闪光的第一步，不只对于梁实秋应遵循既定的学术思路进行更系统更完整的研究，而且也要以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去探察现代中国文学总体系统及那些与梁实秋有相似文化和美学倾向的作家，为现代文学研究进一步开拓新路径和新天地，使自己的学术研究真正达到“偷天妙手绣文章”的理想境界。是为序。

草于 2009 年“五一”前夕

目 录

序	1
绪论 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诗教之维	1
一、理学、礼教、诗教合一的“新儒学运动”	3
二、现代新儒学运动与白璧德人文主义之因缘	11
1. “新孔教运动”：白璧德人文主义运动的中国效应	11
2. 儒学的现代解码：白璧德人文主义对中国弟子们 的意义	23
三、现代新儒学诗教体系寻踪	41
第一章 新文学的另一种选择	54
一、挑战新文学场的权威法则	54
1. 诗是贵族的	56
2. 早期的“唯美主义”主张辨析	66
二、“学衡派的嫌疑”	70
1. 中西化合基础上的东方文化立场	70
2. 与学衡派的微妙关系	78
三、现代性的另一种体认	85
1. 传统的现代转化	85

2. 西方文学话语的本土化	90
第二章 文学话语的诗教品质	96
一、意义的守护：义理式的文学批评	96
二、“理”“欲”之辨的延续：五四新文学是 “浪漫的混乱”	104
1. 批评五四文学的情感放纵	114
2. 建立以理制情的文学的纪律	120
三、“人性论”与“唯物论”：对左翼文学的偏见	133
1. 抽象意义与一般意义：普遍的人性与阶级性	133
2. 古典主义的文学本体观与新古典主义的文学工具观	141
3. 文学的贵族（高雅）性与文学的大众化	146
四、文学批评的皈依：伦理学还是美学？	152
1. 善与美：进乎道与止于技	154
2. 与左翼“新美学”的一种共鸣：人文化成与 经世致用	162
五、“尚雅”的雅舍文风：退而结网的守望	167
1. 人生的艺术化	170
2. 雅健的文质观	174
第三章 文化认同危机时代的文坛经典学案	179
一、文化认同差异：鲁迅的“转变”与梁实秋的 “不知‘转变’”	182
二、反比效应：鲁迅光环之下的反面书写	203
1. 文化偶像与文化“鬼魅”：鲁迅作品教学中的梁实秋	203

2. 两种祛魅：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中的梁实秋	208
三、战士与绅士：两种文化中的人格典范	213
第四章 梁实秋文化身份质疑	227
一、何种意义上的新月派、自由主义西化派、 胡适学人群？	227
二、作为文化国家主义者的国家社会党党员	245
三、政治是非中的“与抗战无关论”者	261
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下的资产阶级 “人性论”者	272
五、儒学意识形态下的台湾“现代孔夫子”	285
结语	296
参考文献	303
梁实秋简谱	314
跋	343
后记	346

绪论 现代“新儒学运动” 的诗教之维

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① 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核心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捍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② 张

① 在我们现代文学研究中，“五四新文化”已经被约定俗成地界定为自由主义西化派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派的文化观念，所以本书在使用“五四新文化”和“五四新文学”的概念时，也默指这两种文化，以及在这两种文化观念基础上形成的新文学。

② 王富仁《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